

功能主义目的论视阈下的翻译主体间性分析 ——兼评《绝句》的两个英译本

□陈 勋 胡 玲 [武汉大学 武汉 430072]

[摘 要] 翻译不是“一种孤立的语言转换活动,而是一种主体间的对话”。翻译的主体间性即译者同委托人、原文作者和读者等翻译主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和联系。文章将功能主义目的论同翻译主体间性结合起来,探讨译者同作者、委托人、读者等翻译主体之间的关系,结合《绝句》的两个英译本,对翻译主体间性进行适当地分析,提出:占主导地位的一对主体间性决定了翻译策略的选择。

[关键词] 目的论; 翻译; 主体间性

[中图分类号] H0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8105(2012)02-0064-04

引言

西方翻译界在20世纪70年代经历了一次转型,主要表现为,研究重点从传统的静态语言学研究转向语言层面外的影响翻译的各因素研究。这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翻译的“文化转向”。随着翻译领域中“文化转向”的出现,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主体性地位逐渐彰显出来。国内关于译者主体性的研究主要出现于20世纪90年代末,并且马上成了广大学者的重要研究领域。但是,“译者的主体作用不是孤立的,而是与作者和读者的作用紧密相联”,且“现代阐释学,尤其是伽达默尔的阐释理论与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认为翻译活动不应被看做一种孤立的语言转换活动,而是一种主体间的对话”^[1]。因此,文章将功能主义目的论和翻译主体间性研究结合起来,探讨译者同作者、委托人、读者等翻译主体之间的关系,并结合《绝句》的两个英译本,对翻译主体间性进行适当地分析。

一、翻译的主体间性与功能主义目的论

在谈“翻译的主体间性”之前,我们有必要先从哲学视角弄清楚“主体性”和“主体间性”两个概念。主体性和主体间性两个概念最早出现在西方

哲学中,西方哲学在发展演化中经历了从前主体性到主体性,再到主体间性的历史过程^[2]。

主体性研究主要出现于早期的西方哲学研究中,但是该研究被引入中国的时间相对较晚,主要集中于20世纪90年代。王玉樑在《论主体性的基本内涵与特点》一文中指出,主体性即主体的本质特征,“是主体在对象活动中的特性”,这种特性可以理解为“能动地改造客体、影响客体、控制客体,使客体为主体服务的特性”^[3]。这种主观能动性在发生作用的时候并不是不受到任何限制和制约的。主体作用于客体,必然在某种程度上受到客体的影响。这种客体的制约,或者说客观环境和条件的制约,也就是主体的受动性。魏小萍曾指出,主体性中的能动性、受动性和为我性是有机统一的,受动性表现为“主体对客体的依赖性和客体对主体的制约性”^[4]。

当哲学走进哲学现代的范畴时,传统的主体性研究逐渐转变为主体间性的研究。“现代哲学是主体间性哲学,存在被认为是主体间的存在,孤立的个体主体贬为交互主体”这是杨春时对现代哲学的总结^[5]。的确,后来伽达默尔的哲学阐释消解了传统的主客体的二元对立体系,促成了主体与主体间的对话关系及单一中心多元化的出现^[5]。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也把孤立的个体转换成了交换主体^[2]。

[收稿日期] 2011-07-01

[基金项目] 武汉大学自主科研项目(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102275945)

[作者简介] 陈勋(1988-)男,武汉大学外国语学院10级英语硕士研究生;胡玲(1976-)女,武汉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简单说来,主体性主要强调主体的各种特性、属性,而主体间性则主要强调各主体间或者是主体与客体间的关系、联系。在翻译的“文化转向”出现之前,翻译领域的学者的研究重点是以原文文本为中心的文本研究,主要强调译者在翻译的时候应该忠实于原文文本,不得在翻译的时候做一些自我发挥;这样译者就一直处于被动且低下的地位,梅纳日(Gilles Menage)称翻译为“不忠的美人(Les belles infidelles)”^{[6]464},意大利人称“翻译者,反叛者也”,更有将其称为“仆人”的。当然,在浩荡的历史长河中也不乏零星的强调译者地位的声音,如尼采便称“翻译即征服”^[7],但是这种涓涓细流的微弱的声音最终没能改变译者的命运。20世纪70年代以后,伴随着翻译“文化转向”的出现,译者主体性的研究也逐渐吸引着越来越多学者的目光。功能主义目的论正是在此背景下兴起,其主要观点:翻译是一种社会性的、跨文化的交际活动,翻译的过程可简述为译者在从委托人那里得到翻译指令(translation briefs)之后^{[8]30},在“功能+忠诚(loyalty)”原则的指导下,充分理解源语文本,“在目的语背景下,为目的语的目的,和目的语环境读者,生产一个文本”(Produce a text at target setting for a target purpose and target addressee in target circumstances)^{[6]377}。从这里我们可以发现,在功能主义目的论中,涉及到的翻译主体至少包括四个:委托人、原文作者、读者和译者,这也就囊括了翻译行为中最重要的几个主体。既然翻译是一种社会性的交际活动,那么翻译进行的过程,从某种程度上,就可以理解为四个翻译主体的互动过程。本文将这些主体(译者、作者、委托人、读者等)的相互作用,或者说是它们之间的联系、关系,定义为“翻译的主体间性”。这四个主体中,译者无疑占据着最重要的位置,因为翻译的最终施为者是译者,因而在翻译的主体间性研究中,本文将主要讨论译者同委托人,译者同原文作者以及译者同读者这三对关系。

二、翻译主体间性分析

(一)译者同委托人的主体间性

按照正常程序,翻译行为进行的过程中,译者最先接触到的翻译主体就是委托人,因而译者同委托人的关系也就成了最主要的关系。委托人“可以是自己,也可以是他人(如出版社,编辑等)”^{[6]380}。弗米尔认为,译者的翻译行为是根据第三方的委托人进行的,委托人会为译者提供相应的翻译指令或

翻译要求,译者将根据委托人的要求确定采用适当的翻译类型^{[6]381}。在这种情况下,译者就需要做到对委托人的“忠诚”,根据委托人的要求采取合适的翻译策略。换言之,此处的翻译策略是由委托人决定的,当然译者也可以同委托人进行沟通,对某些情况下的翻译策略做出适当的调整。刘军平教授在《西方翻译理论通史》一书中举到这么一个例子:

希拉里回忆录英文名为<Living History>,而现在的译林出版社译为《亲历历史:希拉里回忆录》。据了解,媒体在报道该书时,译名不下十几种,原名仅仅两个单词,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译法?如果按偏正结构直译,可以表述为“鲜活的历史”、“活生生的历史”、“真实的历史”,这里是把living作为history的修饰成分;而根据动宾结构翻译,则是“体验历史”、“经历历史”、“活着的历史”;带有译者创意的书名则有“历史实录”、“白宫回忆录”、“现身说史”,等等。译林出版社在新书预告中也译作“活着的历史”。由于译者和编辑们对书名译法有分歧,出版社曾专门开会讨论。后来定名为《亲历历史:希拉里回忆录》,来源于译稿的最后一句话“然后我向这个我用了八年时间去亲历历史的房子说再见”^{[6]392}。

这就是译者同委托人关系占主要地位时的一个典型例子。又如,笔者上次接到一项翻译任务时,对方(委托人)就要求笔者在翻译文章里的人名、地名等专有名词时必须严格按照所配发的译名手册来进行翻译。这就是译者同委托人的关系主导下的翻译策略的选择。但是有些情况下,出于种种原因,委托人未能给译者以一定的翻译要求,此时翻译策略的选择就主要由译者自身来决定。译者可以更看重自身同原文作者的主体间性,也可以更看重自身与读者的主体间性,这两种情形下产生的目的语文本没有对错,只是有着不同的效果而已。

(二)译者同原文作者的主体间性

译者同原文作者的主体间性,实际上就表现在译者同隐身了的原文作者进行交流、沟通的过程。由于原文作者的不在场,这种交流也就演变成译者同原文文本的交流。由于我们每个人的经历、生活成长环境、生活习惯等因素的不同,我们对于同一文本也就会有不同的理解和解释,正如一句俗语所说“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译者怎样才能做到真正理解原文作者的意图呢,或者说怎样才能做到对原文作者的“忠诚”呢?首先,译者应当反复阅读原文文本,对文本本身有一个充分彻底的了解,这也是做好翻译的第一步。其次,就是译者应当站在原文作者的角度、立场上来理解该文本^[9]。这一步通常被译者忽略,也

容易被翻译批评家忽略,但是这一步骤对于一个好的翻译来说确是不可或缺的。站在原文作者的立场上思考问题,理解文本,也就是说,译者应该对原文作者当时的创作状态、创作环境等背景因素有一个比较深入的了解,应该知道作者在当时创造出这样的文本的原因。这样的翻译也就是译者要替作者说话,而且这所说的话应当符合作者的意图。

(三) 译者同读者的主体间性

顾名思义,译者同读者的主体间性,也就是译者同读者之间的交流。实际上,译者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读者,而且对于目的语读者来说,可以看成是第一位接触原文文本和目的语文本的读者。译者同读者的交流,主要表现在译者在翻译时应考虑到读者的预期,考虑到读者的理解程度和范围,也就是说译者要做到对读者的“忠诚”,考虑读者的感受。换个角度看,也就是说目的语文本应当能够符合目的语读者所处的语言环境,对目的语读者来说这些文本应当通俗易懂,或者是能满足目的语读者的某些期望。也可以说,在这种情况下,译者在一定程度上成了“原文作者”,只是这个“原文作者”生活在与译者和目的语读者相同的生活环境中,他们的生活习惯、语言表达习惯都趋于一致。正如郭沫若所说“译雪莱的诗,是要使我成为雪莱,是要使雪莱成为我自己”^[10]。

三、译例分析

《绝句》

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

A Quatrain

A pair of orioles chirp and sing on a green willow,
A line of herons flit in the blue sky high and low.
At West Hill a window frames the years snow,
A big boat from Wu Kingdom anchors at gate slow. (刘军平译)

Jueju

Two golden orioles sing amid the willows green,
A flock of white egrets flies into the blue sky.
My window frames the snow-crowned western mountain scene,

My door oft says to eastward going ships
“Goodbye!” (许渊冲译)^{[6]389-390}

这两个译本都尽量在功能和形式上接近原诗,且都在音韵上下了不少功夫,做到了工整的对仗和押韵。两个译本的区别主要体现在题目和诗中后两

句的翻译上。刘将《绝句》译作“A Quatrain”。“Quatrain”是起源于古希腊古罗马的一种四行诗^[11],同杜甫的“绝句”有一定差异,不能等同,刘对此的解释是“但是为了目的语读者,不用汉语的‘Jueju’,正是让目的语英文读者对此不感到陌生”^{[6]390};而许则将其直接译为“Jueju”,这也有一定的道理,因为当时杜甫作此诗之后,没有取题目,后取名为“绝句”。从题目的翻译中就可以看出,刘译本更看重译者同读者的主体间性,译者考虑得更多的是读者的感受;而许译本则以译者与原文作者的主体间性为主,译者充分地了解了原作作者的创作环境、写作背景等。再来看看对后两句诗词的翻译。“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意为诗人透过(草堂的)窗户看到了“西岭(岷山)”上的雪景,向东便看到了停泊着的从东吴过来的船队。此句中的“西岭”的深一层含义就是西方的佛教圣地,心灵的净化之地;句中的“东吴”则有凡间世俗的意味。杜甫作此诗时已年过半百,仕途不得志,有着远离尘世、向往清静环境的期盼。刘军平将其译为“At West Hill a window frames the years snow, a big boat from Wu Kingdom anchors at gate slow”,这给目的语读者描述了一幅十分具体的画卷,让目的语读者能十分顺利地理解诗词的意思,可以说译者充分考虑了目的语读者的感受。而许渊冲则将其译为“My window frames the snow-crowned western mountain scene, my door oft says to eastward going ships ‘Goodbye!’”。乍一看许译本,显得有点“突兀”^{[6]390},因为原诗中所有的都是无人称诗句,且译文中无缘无故多出了“Goodbye”这一词眼,杜甫的原诗中却找不出一丝“再见”的字眼。许译本给我们传达的意思是,“我”站在窗户前,看到西山上覆盖了一层层的雪,“我”站在门边跟往东行驶的船只说再见。这样我们就能理解许渊冲翻译的目的了,许是在替杜甫说话,他在翻译的时候就是创作时的杜甫,他看到了杜甫当时内心的活动、想法,即对东边世俗生活的告别和对西边清静的晚年生活的向往。所以,从诗句的翻译中也能看出,刘对读者的“忠诚”,和许对原文作者的“忠诚”。需要指出的是,这两个译本都没有对错,只是二者所得到的效果不同罢了。

四、结语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译者同委托人、原文作者以及读者之间的主体间性影响着翻译行为的施行,且其中占主导地位的一对主体间性决

定了翻译策略的选择。因而译者在进行翻译的时候,不能忽视委托人、原文作者及目的语读者对翻译行为的影响,应充分考虑各种主体间性,选择最佳的翻译策略,达到最佳的翻译效果。但是占主导地位的主体间性的确定是一个难点,这也是主体间性研究需要继续关注的地方。

参考文献

- [1] 许钧. 翻译的主体间性与视界融合[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04, (4): 290-295.
- [2] 杨春时. 文学理论: 从主体性到主体间性[J]. 厦门大学学报, 2002, (1): 17-24.
- [3] 王玉樑. 论主体性的基本内涵与特点[J]. 天府新论, 1995, (6): 34-38.
- [4] 魏小萍. “主体性”涵义辨析[J]. 哲学研究, 1998, (2): 22-28.

[5] 黄沛真. 论翻译活动的主体间性[J]. 韩山师范学院学报, 2011, (1): 92-95.

[6] 刘军平. 西方翻译理论通史[M].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9.

[7] ROBINSON D. Western translation theory: from Herodotus to Nietzsche[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6: 262.

[8] NORD C. Translating as a purposeful activity: functionalist approaches explained[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 27-30.

[9] 张铁哲, 文军. 主体间性在汉诗英译中的体现[J]. 外国语言文学研究, 2008, (1): 70-74.

[10] 罗新璋. 翻译论集[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4: 334.

[11] 张柏香. 英国文学教程(下)[M]. 修订本.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6: 676.

A Brief Analysis of Inter-subjectivity in Translation from a Skopos Perspective ——with Specific Reference to two English Versions of Jueju

CHEN Xun HU Ling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China)

Abstract Translation is not just a transmission of linguistic facts, rather, it is a communication between translation subjects. Inter-subjectivity in translation refers to the relation between translator and consignor, author and reader. This paper tries to discuss the inter-subjectivity in translation with two English versions of *Jueju* from the skopos perspective.

Key words skopostheorie; translation; inter-subjectivity

编辑 刘 波